

记者 赵迎昭 摄影 视觉重庆



阿来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文学创作者不要拿别人作为标杆，这样会缺乏独立性。”

“我没有因为旅行、学历教育浪费过时间，两者一相加，我节约了多少时间呀！”

“如果你不认识大自然的花花草草，甚至连错误的名字都叫不出，那你怎么还能说热爱大自然呢？”

近日，“尘埃未落定——写作是我介入世界的一个途径”主题分享会在问闻书店·西西弗总部概念店举行。活动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金句频出，向读者分享了他的文学道路、人生经历以及他对自我和世界的观察。他思考深邃、观点清晰，再加上其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让现场观众品味了一场两个多小时的思想文化盛宴。

“把读书和‘苦’扯上关系，我很不理解”

分享会伊始，活动特邀嘉宾、中山大学教授、博导谢有顺首先介绍了阿来。他说，阿来并没有上比我们更好的中学，也没有考上像样的大学。从成长角度来看，他获得的资源比较

匮乏，但他成了阿来，成了重要作家。从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的文字中，能感受到他在山川河流中自由地行走和思考，领悟到他的精神的厚度和宽度。他抛出了一个话题：阿来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呢？

听到谢有顺这么介绍，阿来笑了笑说，他出生在一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13岁时，他才初次听到“文学”这个词，在他人生历程中，邂逅文学是巨大的意外。

1977年，他考上中专后如饥似渴地读书，至少每天读一本。“起初，我要把三四个同学的读书卡都拿去借书才够看。后来，我请图书馆老师闭馆时间把我锁在图书馆。我没日没夜地看书，困了就躺在长椅上眯一会，觉得成千上万本书都是我的。”阿来说，“读书就应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来苦口婆心地规劝，把读书和‘苦’扯上关系，我很不理解。在我看来，读书是让我们内心美好的感觉持续得最长久的事情。”

读过足够多的经典，也自然能够明白何为经典，也启迪着他如何写出好书。上世纪80年代，阿来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998年，他凭借一部描写西藏土司制度兴衰史的《尘埃落定》享誉文坛，并于2000年凭借这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阿来说：“我是依靠文学，和自己互相成就。”

谢有顺对阿来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阅

读可以超越时空，“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和生动、伟大的灵魂打交道，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选择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阅读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拥有选择权，阿来就是最好的例子。”

“文学当然主要是关于人的，但只有人也不行”

对于读书，阿来有不少见解。“我没有因为旅行、学历教育浪费过时间，两者一相加，我节约了多少时间呀！”他说，他没有读过自己不需要的书，旅行时也不随意“打卡”，“我认为游历和读书可以互相印证，我游历的地方，一定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学传统，或者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提到游历，阿来有些激动。他说，他非常钦佩杜甫的才华，他在游历中邂逅了李白等诗人，结下了友谊。在游历中，作家就是要用双脚和自然山川发生关系，认识动植物、岩石、泥土，领悟自然之美。

在阿来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局限于讲述人和人的关系，似乎人和花草树木没有关系。当代文学中，我们的自然界似乎已经成为“无名世界”。他问读者：“如果你不认识大自然的花花草草，甚至连错误的名字都叫不出，那你怎么还能说热爱大自然呢？”文学当然主要是关于人的，但只有人也不行。”

对于自然，阿来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和耐

心。每到一处，他除了喜欢听各种故事，还对当地的地理尤其植物十分感兴趣。他的电脑里存着数万张他拍摄的植物图片，点击进去仿佛就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希望人们向大自然学习，学习它的一切知识。

阿来提倡“感官全开”。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的生命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那是杜甫所写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伟大时刻，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刻。这些伟大的时刻是身心俱在，感官全开，是语言与情感和意义相融相生的伟大时刻。

“不要以为没有记住的书、观察过的自然没有意义，它们已经沉淀在心中，是写作的源泉。”谢有顺对阿来的“感官全开”颇为赞赏。他说，阿来写作时，他的五官都是在参与的，他的文字充满了对世界、声音、色彩、味道的复杂感受。有了这种复杂感受，作品便自然进入了斑斓的世界。他的小说是舒展、宽阔、从容、平静的，如果没有阅读、游历做基础，把作品写细腻、宽阔是不可能的。

“我从来不建议把纸质书和电子平台对立起来”

眼下，人们的阅读方式也有了多种选择：读电子书、听书、看纸书等等。有人感叹纸质

书正在失去市场。对此，阿来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从来不建议把纸质书和电子平台对立起来，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而在于它本身蕴含了多少智慧。”阿来说，今天，只要有一部手机，有一个搜索引擎，等于把全世界的图书馆都带在身上，读书比原来方便多了。手机上也可以进行很系统很严肃的阅读，就看你去找不找，愿不愿读了。

“无论通过哪种媒介，我们都要尽可能多读一些更经典、更有价值的图书。”阿来说，一部经典作品，被放在网络上，它仍然是经典。最近，他正在手机上读《二十四史》。他打趣道：“如果把这些书都搬回家，那我要多买一间房子；打车或开车去图书馆看《二十四史》，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和交通成本。”

谢有顺对阅读方式的变化感触也很深。“今天这个时代，阅读是被分解的。不能把阅读单纯地理解成读一本纸质书，现在的年轻人通过各种媒介、各个平台阅读。试想，李白杜甫有微信的话也会发朋友圈，到哪游玩了、遇见哪个知己了，这些不是很适合发朋友圈吗？”他说，目前很多人缺少有深度、难度的阅读，比如用一段时间阅读一本大块头等等，应该多引导读者读一些有难度的、蕴藏更多智慧的书。

【跟着名篇学党史】⑩

梁伯隆在遗书中表达革命必胜信念：

革命一定能成功！人民一定能当家做主人！



梁伯隆

(受访者供图)

远赴上海寻真理

1904年，梁伯隆出生在四川省江安县一个私塾教师家庭。1919年，梁伯隆到江安县立三中学习。时值五四运动爆发，民主、科学的思想对他产生很大震动。1921年上半年，他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

“梁伯隆在上海亲眼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恶行和军阀政治上的黑暗腐败，从而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曾友和说。

1923年7月，梁伯隆从职业学校毕业，考入上海震旦学院法政科。1924年下半年，梁伯隆到黄埔军校军需科任职，并于1925年春参加了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不久因病辞职返回上海。同年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日本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由此爆发。

“梁伯隆从五卅运动的斗争中看到了救亡图存的希望，在心中埋下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种子。”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瑞介绍，1925年8月初，他毅然加入了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不久后便加入中国共运。

1926年底，梁伯隆奉调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途经九江时，被九江国民党左派挽留。1927年3月17日，九江惨案发生。梁伯隆在这一事件中九死一生，来到武汉。不久，他又奉命去南昌任《贯彻日报》主笔，旋即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十一军军部工作。起义军在向广东进发途中，他奉命调到周士第率领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担任宣传和支部工作。起义失败后，梁伯隆又回到上海工作。

与敌苦斗在渝蓉

1928年底，梁伯隆奉党的指示从上海到重庆。

曾友和说，经21军驻沪代表傅真吾和重庆《新蜀报》主笔王伯禹介绍，梁伯隆得以会晤四川军阀刘湘。他利用刘湘欲办学培养军政人才之机，建议在重庆办一所高级中学。

1929年4月7日，重庆高中在原巴县议会旧址正式开学，梁伯隆被委任为校长兼21军编译委员。这所学校办学骨干主要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除了教授国文和外语外，还公开讲授《社会近代史》《社会科学概论》《共产主义ABC》等内容。

随着重庆高中的影响日渐扩大，引起了四川军阀当局的关注。当年7月，重庆高中被迫停办。之后，梁伯隆等又自筹经费，在重庆南岸胡家祠堂开办了西南学院，梁伯隆任院长。这所学校的师生多数由重庆高中转来，教员系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不久后，西南学院被强行解散。

“两次办学均遭扼杀，梁伯隆很难在重庆

继续活动。”曾友和说，经四川省委指示，梁伯隆等人转移至成都，创办西南大学。1930年春，西南大学开学。“梁伯隆在党的领导下创办学校，是为了开启民智，同时以教师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阵地，梁伯隆还在成都主办了《西南日报》(后改名《锦江日报》)，并且在学生中组织了“前卫社”和“新兴剧社”，由这两个进步团体组织同学到少城公园或别的地方进行演讲或演出话剧。

王瑞介绍，他们演出的剧目有反映工人不堪资本家压迫而举行暴动的《炭坑夫》，有反映农民不堪地主军阀的压迫而暴动的《黑暗里的红光》等。当成都发生抗捐罢市风潮后，梁伯隆组织全校学生会加入市学联，进行有力的声援。

写下气壮山河的遗书

1930年6月8日，市学联联合在仁厚街西南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执委会。梁伯隆得知军警团要去镇压的消息，便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骑自行车赶去通知开会人员撤离。当大部分同志撤离后，梁伯隆不幸被捕。

曾友和说，梁伯隆在狱中时，党组织和他的亲友曾多次设法营救，但均未成功。梁伯隆虽身陷囹圄，但对革命的成功始终抱有信心。

1930年10月28日下午，梁伯隆在临时执法处转到军警团办事处。这时，梁伯隆已经预料到军阀将要对自己下毒手。他自知时日不多，于10月30日在狱中写下遗诗：“……奉党指令返天府，与敌苦斗在渝蓉；大志未成身先碎，流芳百世主义真。为党为民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坚；要杀吾头何所惧，共产真理留人间……”

此外，梁伯隆还给亲人写了一封遗书：“我大概离死期不远，请你们不要悲伤……我的死是为世界上千百万劳苦大众而死，我很感觉得光荣！革命一定能成功！人民一定能当家做主人！我死以后你们就当我国人去留学……”

曾友和表示，这封遗书中洋溢着梁伯隆为追求真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流露出对亲人的宽慰之情和深情牵挂。

10月31日上午，军警团的执法官以“共产重要分子”之罪名，判处梁伯隆死刑。10点钟，梁伯隆昂首挺胸，在军警的簇拥下向刑场而去。临刑前，梁伯隆面对围观群众，用悲壮宏亮的声音演讲。半个小时过去了，在监刑官的敦促下，他才结束了演讲。枪声响起，梁伯隆从容就义。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王瑞说，如今，我辈应以梁伯隆等革命志士为标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传承伟大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询问与解答：为什么是中国



□张波

任何民族的伟大复兴都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都要经历血与火的淬炼。

“散沙、变局、星火……”金一南将军的《为什么是中国》用八个关键词标注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行动坐标和智慧密码，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从甲午中日战争至21世纪世界新格局形成之间的历史全景和奋进历程，带我们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在泥泞中前行奔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力。

作者用独特的历史视角和犀利的文字，带我们穿越岁月的苍茫，回望走过的路，从历史中获得启迪；用理性的现实分析和鼓舞的语言，带我们搏击时代的机遇，关照复兴之路，从当下中增强自信；用建设性的思考和前瞻的眼光，带我们触摸未来的中国，远眺前行的路，从蓝图凝聚力量。

阅读这本书，需要一个支点，把脉著者的逻辑，追随作者的思维，思辨书中的观点，达成一种阅读场域的共识。

一个好问题往往胜过无数个好答案。一个好的问题便是这个“支点”，它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共识，达成当时之事和当今之人的共鸣，带领读者跟随作者去寻找一种答案，进而延展认知。

金一南将军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蒋廷黻之问”，将其视之为中国人需要作答的“世纪之问”。1938年，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一语道破此前此二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使命与追求：“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为什么是中国》穿越近百年的历史风云，回扣“蒋廷黻之问”，用“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自觉”“抗战胜利的能力密码”“朝鲜战争

的鸟瞰钩沉”回答了“世纪之问”，并坚定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阅罢，相信你会有同样的认识。

阅读这本书，需要一个基点，读懂著者的智慧，叩问作品的初心，把握作品的使命，完成一次阅读情感的接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为什么是中国》着眼当下，携着180多年的历史记忆带我们躬身入局，在历史回望和现实关照中与中华民族的英雄握手，体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为我们完成了一次情感上历史与现实的接力，坚定奋进中国梦的新征程。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为什么是中国》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三个“时代之问”为现实基点，翻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画卷，在历史回眸中向我们全景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政治品格、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伟大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共产党人是苍穹之上的星光，是大地深处的岩浆，势可燎原，照彻未来。越曲折，越奔流；越苦难，越辉煌。从失败走向胜利，以智勇缔造奇迹。”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历史自觉，就是从来不曾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也从来不曾将自身经验绝对化，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用中国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这个党能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种种成功的最大优势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的优势，我们分三点来讲：制造优势，市场优势，开放优势。”

带上这三个问题，阅罢，相信你会有自己的答案。

阅读这本书，需要一个落点，沿着作者的推演，接续作品的启迪，进行一次阅读视野的迭代。

《为什么是中国》以“大势”开篇，用宏阔的世界视野，直面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如何有效应对挑战，实现发展”的理性研判，为我们解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提供一个好的建议。

金一南将军认为，“新中国的诞生，让中华民族从政治上摆脱了颓势；跨过鸭绿江，让中华民族在军事上摆脱了败势；改革开放，让中华民族从经济上扭转了劣势；到今天，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什么是中国》用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解答这个“世界之问”，强调中国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李大钊先生曾说过，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力拼搏。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我的死是为世界上千百万劳苦大众而死，我很感觉得光荣！革命一定能成功！人民一定能当家做主人！”这是1930年，一位26岁的青年人在遗书中写下的振聋发聩的语句。

“这位青年人是梁伯隆烈士，他的这封遗书就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现为国家二级文物。”7月5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曾友和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1921年，梁伯隆远赴上海寻求救国真理，至1930年10月31日在成都英勇就义，近十年间，他给亲人写了多封家书，其中部分原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些书信，记录了梁伯隆短暂而辉煌的革命历程。